

政智畅通确保智库成果落地

□ 张会恒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政府的许多重大政策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仍然存在着“智库与政府沟通不畅、体内循环多、成果转化少”的问题，这一现象受到学、政两界的广泛关注。

沟通偏差制约成果转化

智库与政府沟通机制的良好运作是增强智库政策转化力的根本途径。然而，在智库与政府沟通过程中，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制约了沟通机制的构建。

沟通“问题”存有偏差导致智库成果体内循环多、政策转化少。智库与政府的沟通始于“问题”，智库针对政府所关切问题进行研究。由于部分地方党政层面对决策咨询重要性认识不足，例如，某社会智库主动向某省政府厅局提出自费就其系统内普遍存在的某一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被以“扰乱工作”为由拒绝。

由于智库与现有的科研机

构运行体系不兼容，在成果评价体系等方面不接轨，智库主动和党政部门沟通“问题”的能力不足，从而导致智库和政府就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智库往往找不到“真”问题。政府常常依靠熟人和圈子找决策咨询专家，智库依靠自身有限信息来满足政府的决策需求，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产品不对路等问题。从而导致智库成果体内循环多、政策转化少。某省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部门负责人抱怨，他们花费数万元进行调研写出的研究报告，或递送不到领导手中或得不到批示而束之高阁。因此，构建智库与政府沟通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两者关注点的一致性，以此协调供求偏差。

政智互通形成良性互动

沟通“载体”质量不高导致政府与智库间互不信任。智库与政府能够良好沟通的关键是智库成果质量的高低。但是，目前智库成果总体质量不高。智库成果质量取决于智库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

研究经费的充裕度和来源渠道以及智库的运行机制和评价机制等。

在当前传统的学术研究机构向新型智库转型的过程中，以上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导致智库研究成果过于理想化、可行性低、针对性不够，也会逐步形成政府对智库建言议政的能力产生不信任感的局面，从而导致成果转化少。反过来，智库人员因成果很少被采纳或政府课题结项时往往被“批评”，而更愿意做学术课题（出版学术论文和专著就能顺利结项），不愿做政府课题，也不愿主动和政府部门沟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某些智库近两年被领导批示或内参选用的政策建议中，大多是围绕精准扶贫、生态建设、金融风险等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及解决办法，以及围绕本地区域发展、产业成长等方面的重大发展战略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撰写的。建议报告找到了“真问题”，而且集中在少数智库人员身上，说明形成了良性互动。但是大多政策建议或

因找到的是“伪问题”，或因因语言表达等问题而得不到采纳，从而形成党政领导或政府部门对智库的偏见，以及智库人员对党政部门不采纳的不理解或抱怨，从而形成双方互动的恶性循环。

上通下达保障政智互通

沟通“渠道”不足导致政府“问题下达”和智库“建议上达”受阻。一方面智库缺少专门的“问题”收集分析人员和成果转化推送人员；另一方面智库专职研究人员积极主动从各种官方渠道整理、分析“问题”以及成果推广的动力和精力也不足，导致当前很多智库研究“问题”的获取和研究成果的推送遇到阻碍。

目前存在的不少智库产品与党政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存在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和低端产能过剩并存现象，部分智库苦于找不到产品输出接口，智库不能有效地嵌入政策研究或决策系统，正是政府“问题下达”和智库“建议上达”阻梗的表现。

在“建议上达”方面，某省几个主要的智库成果上报渠道

因缺少高质量的成果而停止报送或很少报送，而众多的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却因找不到报送渠道而求助于私人交情。现存的众多报送渠道，或因级别不够不能真正起到报送渠道的作用（如各高校的内参渠道），或因需要经过办公厅、秘书处等机构甄别筛选而难以直接上达。

畅通是成果转化的保障

沟通“语言”存在差异导致智库成果信息传递过程受阻。智库成果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文章结构往往和政府的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在语言表达习惯上，高校智库往往采用理论性、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语言，而政府则期望智库运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智库倾向于直接的问题揭示性表达，而政府则倾向于间接的问题描述性表达。智库的语言强调逻辑性、严谨性和准确性，而政府倾向于易记式、形象式的表达。这种语言表达上产生的偏差会导致信息传递进程缓慢，智库成果使用效率低下，智库与政府沟通机制的“信息传递”过程受到阻碍。

很多数万字甚至十几万字的研究报告，难以改写成两三千字的政策建议。现在地方政府官员的理论水平逐步提高，对实际情况了解更加深入，掌握的信息量也很大。某智库专门聘请有经验的人员对智库人员的成果，特别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进行语言等改写，其推送智库成果的采用率就明显提高。

沟通“人员”缺失导致寻找“问题”偏差及智库成果推介不力。大多智库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国智库以研究人员为主，缺少行政人员，更谈不上像西方智库那样，一个研究人员配备多名行政人员，特别是配备用于和政府、媒体沟通的人员和智库成果推介人员。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巴西智库与中资企业等共商“一带一路”合作

巴西最大智库瓦加斯基金会与巴西中资企业协会等机构日前在里约热内卢共同举办研讨会，共商推动中巴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的新途径。图为瓦加斯基金会巴西研究中心主任埃万德罗·卡瓦略在研讨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李明 摄

□ 石旭斋

智库与政府沟通不畅既有智库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方面的原因；既有沟通渠道少的问题，也有沟通人员少的问题。因此，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赋予智库决策知情权

将智库咨询在决策中的地位法制化和制度化。需要通过法规制度把政府对智库成果和潜在需求制度化，解决需求不足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要完善规章制度，从制度上赋予智库更大的决策知情权、决策介入权、政策评估权与智力报偿权；要建立重大决策咨询制度，建立智库采纳制度以及决策机构对智库成果的回音机制，形成政府与智库间的良性沟通；政府相关部门编制年度经费预算时，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安排决策咨询成果购买经费，将智库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纳入采购范围和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引导智库市场有效供给。

以高质量提升政智互动

以高质量的智库成果不断提升智库与政府沟通的良性互动。强调以下五点。一是提升

建立政智互动绿色通道

建立智库与决策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与成果报送机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为政府推送智库研究精品成果

智库的专业化程度，准确定位智库的特色和研究重点。理论研究、战略决策、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综合性高水平智库可以四者兼顾，但对于一般地方性智库而言则应有所侧重。二是强化智库成果的品牌意识。要打破智库研究水平普遍不高的困局，智库亟须制度改革，打造稳定、专业化的研究队伍。使智库由综合化发展阶段向专业化发展阶段迈进，并进一步向品牌化发展阶段迈进。三是积极主动与决策部门进行沟通。智库应主动与决策部门建立一种常态沟通机制，了解掌握其需求，增强研究和建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四是以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协同创新。智库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建设跨学科、多主体的研究平台，实现文理之间、高校之间、校府之间的有机融合，使不同的研究主体围绕共同研究的问题开展高水平的研究。五是优化智库人员结构。一方面，增加智库

与政府信息沟通人员和成果推广人员数量。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拓宽智库与决策部门交流、联络、合作的渠道，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各种形式主动、积极地渗透到有关决策部门中去。

建立以省级层面智库联盟为平台的沟通主体。由省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策研究室或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牵头组建省级智库联盟。该联盟比起单个的智库更有利于与决策部门的沟通。一是有能力推进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部门人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二是能够建立统一省级服务平台。平台不仅有利于政府与智库的互信和沟通交流，也有利于解决单个智库解决不了的其他问题。三是建立智库与决策部门间的常态化沟通与成果报送机制。汇编智库成果专报，定期报送省委、省政府，拓宽成果应用转化渠道，提高转化效率。探索建立

绿色通道，确保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政策咨询、对策建议快捷传递。四是整合各类智库研究资源，形成研究合力，开展联合攻关，为政府推送智库研究精品成果。

促进智库政府双向沟通

创新智库与政府直接双向的沟通渠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可以以政府智库和媒体智库做中介，以及直接和地方政府合建智库的方式开展与决策部门的直接双向沟通。发挥媒体在智库与政府沟通中的中介作用。资深媒体人往往对政策的把握比较准，对政府关注点和社会热点、难点有极强的敏锐性。因此，更能找到领导的关切所在，更能发现一些问题并推荐给智库加以研究，也能很好地把智库成果用适当的方式和语言推向政府和社会。

智库与地方政府合建智库。一些智库和地方政府合建研究该地区或该行业的智库，

能很好地解决智库和政府沟通中存在的问题。

智库成果转化形式多样性和采用时间的滞后性应当得到认可。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参与政府制定政策及决策的调研、座谈会，向政府提交政策建议，参与起草政策法规，接受媒体采访引导舆论和阐释政策，以及通过发布研究报告间接影响决策等，其智库成果的转化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智库提出的概念、理论、措施被政策文件直接和间接采纳，智库的研究成果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进而引起决策者的注意等。同时，有些前瞻性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得到决策部门当时的采纳，若干年后证明专家建言的正确性或适当条件下被政府采纳。因此，不能仅以领导当时的批示作为成果采纳多少的唯一判断依据，也要认可非显化化和非短期显示的智库成果。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法学教授）

观点

提升智库人才培养质量

□ 鞠维伟

智库人才培养需要高校、智库机构、政府等共同参与。改变“有库无智”现状必须下决心做好智库人才的培养工作。

各类智库机构在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对智库人才的“苗子”进行“深加工”，让更多青年才俊有机会进入智库。国家有关部门应要求智库，特别是官办智库制定专门实习生招收规则，激励和督促各类智库机构积极招收实习生。同时拥有办学实力的智库机构，如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等都拥有自己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可以利用自身的智库资源结合本科、研究生教学，让学生协助、参与智库研究项目，从中培养发现智库人才。

政府要做好智库人才培养方向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工作。一方面引导高校、专业科研单位明确在智库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职能；另一方面结合国家需要向高校、科研单位发布“智库人才订单”，明确在哪些领域需要何种智库型人才，让智库人才培养单位有的放矢。

建立适合智库型人才的评价标准和体系。首先，我国智库机构在招收研究人员的时候，不应以学历、学位以及科研成果为主要参考指标，而是寻找符合智库研究领域和目标的相关人才，不要片面追求高学历，要重视人才学科背景是否具有交叉性，是否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其次，应以智库成果作为评价智库型人才的主

要指标。智库最大的职能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分析相关信息，并通过媒体发声来解读政策主张，影响政府决策。智库成果不是长篇文章，而要言简意赅、清晰易懂、直指问题核心。今后应进一步完善智库成果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将政府部门采纳情况、领导人批示以及社会影响力（如媒体曝光率、转载率）等诸多因素纳入到智库成果评价中。建立起专门的智库人才职称评价体系。智库人才的职称系列应与学术型人才的职称系列相互打通，这样人才可以自主选择擅长的领域，激发人才积极性和潜力。

完善智库人才交流机制。智库人才需要多学科交叉背景，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实践性知识。要使智库人才获得这些能力和素质，人才交流机制则是必不可少的。我国的“旋转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所以要逐步探索建立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间的轮交流机制。智库应给予前任政府机构交流人员一定的政策、物质保障；同时把在政府机关挂职履历作为智库人才评价、职称评审的一项内容。在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企业的教学、科研部门设立人才交流、挂职的“流动工作站”，构筑智库人才的“轮训”基地。

完善智库间的交流机制。国内的智库学者“走出去”的良好发展势头要保持和加强。同时要做好“引进来”的工作，增加接收国外访问学者的数量，简化邀请手续、下放邀请国外学者的权限。

观点精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万代玺

注重逆向思维提供建设性意见

科学的决策源自倾听不同的声音。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要注重逆向思维，以便提供更富有建设性的思路

和意见。科学决策过程通常包括五个步骤：一是发现问题，二是发现问题后调研、找数据、找资料，三是设计解决问题的方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杨亚琴

智库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提升

进入新时代，中国智库也进入了发展新阶段，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前者主要表现在智库建设滞后于实践发展。新型智库要在战略性、前瞻性上出思想、出成果，提出更有针对性、操作性、精准性的措施方案。后者主要表现在评

价体系上存在“唯批示论”的误区，同时在管理方式、机制建设方面有待突破，还存在制度保障不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新型智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的提升，要在提高管理能力、运营效率、加强开放合作等方面更有作为。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石泉

以新型智库作用改进领导方法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充分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特点，坚守社会主义价值立场。新型智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做有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关键期。

广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发挥作用的复杂、盲区扩大。对此，要善于用智库，通过智库建设推动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以新型智库的作用发挥改进领导方法，实现领导能力的不断提高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

智库建设要注重新技术运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应用，可以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应用能力、研究能力，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新型智库精准

服务的能力。广大智库从业者既要深入研究，又要避免陷阱。在此过程中，要完善配套设施，以更好发挥新型智库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的支撑作用。